



白定刻花蓮瓣紋龍首淨瓶
定州博物館藏



北宋 白定刻花如意紋龍首淨瓶
定州博物館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 仿龍泉釉青瓷軍持），高二一公分，撇口，折唇，長頸，溜肩，瓜形流，圓腹，矮圈足。全器施青釉，釉層薄而均勻，淡綠如新荷初現，綽約可人，然入手沉重適當。近年東亞、南亞佛教、回教國家出土軍持及研究日益眾多，不可小覷。

「軍持」（Kendi）是外來語，為宗教及俗世兼用的合金或陶瓷水器，無執柄，用時手握瓶頸而傾。

Kendi呼為軍持的詞源頗為複雜，軍持出自音譯梵文（Sanskrit）的「流嘴壺」kundi，或kundika（中國佛教稱為寶瓶），梵語的「ka」為「減小後綴語」（diminutive suffix），凡是梵語後綴以「ka」，均指前文較小之器。因此kundika，就是比kundi較小的「小流嘴壺」，猶如比雪茄（cigar）更小的香煙，就會加「減小後綴語」的「ete」叫香煙（Cigarette）。Kundi為kundika簡稱，但大小混淆不清。（註一）印度婆羅門及東南亞小乘佛教國家的Kundika就有高達三二一公分的銅壺，其特異處為流嘴多有小蓋，倒水時反多自狹長壺口傾出。

台北歷史博物館藏唐代合金製成的「響銅軍持」，高二六公分，黑亮收腹，高逸俊雅，正是這類小乘佛教地區軍持漢化後的影響。一九六九年河北靜志寺出土有北宋鎏金銀淨瓶軍持，高二六公分，造型同樣俊逸高雅，小口細長頸，腹豐滿，流有小蓋，有銀鏈連接，頸上圓盤上刻銘文「張氏李氏劉氏王氏崔氏梁氏張氏」□吳三弟子愿生生供養」。現藏定州

市博物館。（註二）

軍持成中國貿易瓷出口後，荷蘭人呼為「gorgelet」，源自葡萄牙語的「gorgoleta」（註三）。印尼爪哇（Java）等地把軍持分別呼為gendi、gandi、kandi、kondi或kindi。而馬來西亞的馬來語呼為kendi，因馬來亞（Malaya）早年為英屬殖民地，kendi一詞就被英語世界接受為這類水器的合法稱呼。

然而kendi音譯為「軍持」，應是印度梵語與中國中古語發音有關，中古音「軍」唸梵音「kun」（不唸jun），因此早期稱「君壺」（kundi）或「摺雅迦」（kundika）。「君」、「摺」、「軍」中古音同；「持」、「壺」（壺字常為梵文音譯字transliteration，咒文如〈大悲咒〉內皆用）、「稚」亦同，只不知是否與手「持」而傾的聯想義有關？

第一個提到軍持名字是在印度求經的僧人法顯（三三七—四二二）。他於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因「慨律藏殘缺」，和慧景、道整、慧

奶子軍持 淨水聖器

張錯

國立故宮博物院早在一九六七年便已注目民窯與官窯的互動，並舉辦大型學術會議「貿易瓷與宮廷瓷」研討會。二〇一〇年六月，故宮又以「錦繡自玲瓏——院藏貿易瓷特展」，展出自九至十九世紀中國貿易捐贈藏品。展期長達年餘，直俟二〇一一年八月。其中有葉義醫生捐贈的宋明軍持數件，均為外貿瓷。



清 仿龍泉釉青瓷軍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長彎細流彩釉軍持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南海（海外）寄回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詳細記錄了海外各地僧伽制度及戒律把持，就連如何漱口沐浴、方便如廁，也鉅細靡遺。書中第六（水分兩瓶）內載：

凡水分淨觸（濁），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瓷，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則淨手方持，必須安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可於觸處置之。

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盛淨水用的持器，包括飲用之合時水，應採用陶瓷。盛濁（觸）水用的持器，包括沐浴或方便後洗滌的貯水，可採用銅鐵製成的水壺。這也就說明了法顯提到的「君壻及澡罐」，可能就是淨瓶及洗濯的貯水壺。後者較大沉重，所以法顯在風大船危中，把「君壻及澡罐」棄擲海中。

但義淨又提到製瓶之法：

其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竄如銅箸，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擁口令上，豎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受二三升，小成

無用。

那就是說淨瓶製型，高兩指的狹長小口，小孔流管通向瓶口，粗細只有一枝銅筷。又在瓶腹別開圓孔，另堆流口朝上，約二指長，開孔如銅錢大，用於裝水。如此一來，亦未提到把手，這些淨瓶都叫「君稚迦」（Kundika），那便應是軍持的「原型」（Prototype）了。

軍持器型在中國的類型特徵風格從六朝隋唐開始，即為唐代義淨描述的淨水瓶，在北方白瓷青瓷等窯場燒造，包括湖南長沙窯都有。北京故宮藏「白瓷淨瓶」定為唐代，被描述為「盅口，細頸，頸中部出塔沿，肩豐滿，腹下漸收斂，足外撇，淺圈足，小彎流，流口也作盅形。此類瓶式大多出於晚唐、五代的墓葬中。」（註四）魏禮澤（William Wilets）在其《中國藝術》一書提到早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錫蘭的印度佛教藝術專家Ananda Coomaraswamy（一八七七—一九四七）在佛像雕塑中注意到觀音手持淨瓶就是「君稚迦」，但魏氏置疑觀音手中所有的淨

應、慧遠四僧自長安出發，往天竺尋求戒律，歷時十一載，經三十餘國，歸國後著《佛國記》一書，記錄西行見聞，是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資料。《佛國記》第五十九（自師子國到耶婆提國）（即是自斯里蘭卡到蘇門答臘）內提到海上回程中：

得好信風，東行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

人恐人來多，即斫繩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滿，即取粗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壻及澡罐並餘物棄擲海中。

君壻即軍持。可見漢魏六朝已自印度傳入中國，為佛教水器，至隋唐佛教興旺而大盛，屬比丘隨身十八物之第四物，「菩薩行頭陀時及游方時，行來百里千里，此十八種物常隨

其身」（《梵網經》卷下）。但是必須注意到法顯提到的「君壻及澡罐」，僧人所用的軍持水器有兩種，分貯淨水與濁水用。

唐代除玄奘赴印度取經外，另一就是於咸亨二年（六七二）自廣州搭乘波斯船出發西行求法，留印度達十年之久的唐僧人義淨。他回中土後除譯《華嚴經》外，還寫了一本自



明初 雙角新月青花壺



明宣德 牡丹纏枝青花軍持 經修復後 鴻禧美術館藏



明洪武 釉裡紅豐葉繡枝牡丹軍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則有佛置拈稚迦跡，深寸餘，作八出花紋。
淨瓶到宋元則多在定州燒成定器，以青、白為主。一九六九年定州靜志寺、淨眾院兩寺院舍利塔基地宮出土多件定窯瓷器，淨眾院東、西、北壁均有壁畫，主要表現佛祖涅槃變相，畫意淒戚哀婉。出土一。六件文

瓶均是「君稚迦」，或手持「君稚迦」的菩薩均是觀音。（註五）
在論及唐代瓷器時，魏氏特別提到上述北京故宮藏唐代「白瓷淨瓶」形狀的長窄頸瓶，應就是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君稚迦」，他認為當初（Coomaraswamy）雖在雕塑上對觀音手持淨瓶是一種誤稱（Mismomer），但在



元 德化窯 白釉軍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發展出來的淨瓶，正是印度梵文稱謂的「kundi」、「kundika」或「kamandalu」。魏氏跟著翻譯了整段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內製器之法，小孔流管通向瓶口，粗細只有一枝銅條。流口朝上，開孔如銅錢大，用於裝水的描述，以對證唐代淨瓶。同時指出《陶說》內就在「君持」條目內稱銅、瓷



元—明 福建 磁灶窯 綠釉軍持 葉義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兩種，而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記》內亦提到「拈稚迦」。自唐後四百年多用作法器或墓葬器。（註六）
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第十七國「小孤山佛遺跡」內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

物中，內有五十五件北宋定器，其中靜志寺有（白定刻花如意紋龍首淨瓶）、淨眾院有（白定刻花蓮瓣紋龍首淨瓶），高二五五公分，長管細口，高頸收窄以便握持，肩及上腹飽滿，肩部出短流龍首，張口吐舌，生動靈活，煞是可愛。（註七）

鄭和三十年內七下西洋，攜往東南亞國家給佛教與伊斯蘭教用的淨水壺不計其數。明朝是軍持風格一個過渡演變關鍵，與穆斯林教徒默禱誦經前後用作聖水壺，同時亦可在作團體互相傳飲、器不沾唇之用有關。馬來西亞軍持研究專家（Knoo Joo Ee（邱如意））博士在其（Kendi - Pouring Vessel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llection）（《軍持——馬來亞大學收藏的水器》）一書內開章明義指出軍持在東南亞農村社會自古至今原有雙重功能，宗教淨水儀器及仰首持壺離口而飲的水器，無可置疑。她繼續指出這類傳飲器，極宜宗教、社區（Communal）傳飲，而節省掉個人飲具。如此看來，宗教淨水祝聖後用軍持作傳飲器，離口而飲，保持衛

生亦有道理。跟著荷蘭學者多人如：Volker, Christian Jorg 指出，外貿軍持細流大批輸往伊斯蘭國家，在古波斯地區一帶轉用作加管吸水煙器（Water Pipe）有關。（註八）用作儲水的煙座軍持叫 kalia，奶狀流咀短肥。後期土耳其水煙器叫 nargileh，最後進展入印度莫臥兒帝國貴族（Mughal）稱為水煙器叫 hukah。

淨水瓶本為佛教僧人在法事以淨水（Lustral Water）灑洒、辟邪庇佑，或潔淨法器與佛像揩抹之用。殘唐五代入宋的八棱祕色淨水瓶就是著名器例。明清軍持不一樣，它在北方河北、南方的閩粵、江西一帶燒製，很多是外貿瓷，器型按需求訂燒。譬如印尼蘇門答臘出土一只雙角彎出如新月、中間管狀壺咀的明代青花軍持，上面加鑲馬來銀器護件於角上及壺咀，明顯為馬來印尼群島伊斯蘭教徒訂製，並受印度雙角銅瓶風格影響。（註九）

宋明軍持另一種器型特徵為敞口長頸圓腹，有凸弦紋，饒富漢意。最容易辨識為肩腹間有一斜斜向上的



明萬曆 青花軍持 沉船 作者收藏

扁菊紋、及蓮紋釉裡紅軍持已代表了三種主要紋飾。^{（註十一）}但早在二〇〇〇年六月蘇富比及二〇〇八年五月佳士得分別拍出兩個梅竹茶花釉裡紅軍持，據蘇玫瑰（Rosemary Scott）稱，此壺唯一相同紋飾僅沙可樂醫生（Arthur M. Sackler）所藏相同，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所藏僅有茶花為紋飾，並無梅竹。如此一來，釉裡紅軍持應有四種主要紋飾了。^{（註十二）}

青花軍持亮麗亦不遑少讓，因也是青花外貿瓷，圖案經常出現克拉克（kraak）的分屏風貌，日本伊萬里及柿右衛門皆生產軍持。一九七八年四月「東南亞陶瓷學會」（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Society）與「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合作展出「中國青花瓷」特藏，讓人一窺全豹，並藉比較得悉青花軍持由明到清的造型演變。基本上後期宣德、萬曆軍持奶子狀的短流，已明顯漲大為球莖型流（bulbous spout），但流口極細，水道窄而出水細。^{（註十三）}宋代宋庠有一首祈雨七律〈春季開無畏靈塔祈雨至夏初霧洽〉，內有四句：

春晦西峰雁塔開 香雲清梵徹昭回
初疑咒鉢降龍出 終似軍持注水來
可見雨量並不傾盤，當初以為有如被咒語關在鉢盂的蟠龍釋出，大施雲雨；可惜雨勢終是像軍持注水那般，細水長流。

其實軍持型體由宗教器具進化入水器具在明末清初已見端倪，其明顯特徵在於延伸瓶頸，以便握持。台北鴻禧美術館曾藏所謂由明入清「過渡期」（Transitional Type）的一只「崇禎青花人物蓊齊瓶」，其特徵就是瓶

管狀直流（long, slender spout），流的畢直型狀與十八世紀清代出口貿易瓷的西式藤柄茶壺所謂的「子彈流」（bullet spout）很相似，行家一看，便即心中有数。可惜目前流傳東南亞出土或海撈宋元民窯軍持，以宋代德化印花白瓷或刻花褐釉為多，亦有殘

損褪色，燒造粗糙，難入雅堂。但在中國景德鎮官窯出土的明永樂白瓷長咀軍持及宣德青花長咀軍持，有如藍天白雲，風采俊雅，雍容秀麗，不掩國色，不可同日而語。^{（註十）}

清代藏傳佛教法器盛行，乾隆年間便有五彩繽紛的釉上或釉下彩轉型損褪色，燒造粗糙，難入雅堂。但在中國景德鎮官窯出土的明永樂白瓷長咀軍持及宣德青花長咀軍持，有如藍天白雲，風采俊雅，雍容秀麗，不掩國色，不可同日而語。^{（註十）}



明 福建 黃綠彩龍紋軍持 葉義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長彎細流軍持，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布蘭律治收藏」（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四只長彎細流彩釉軍持，便是長直細流軍持的轉型。」

明清軍持，也是目前收藏流傳最廣的軍持；細咀、窄頸、圓胖球身，球身漲出一道肥短奶狀流咀（mamiform spouts），俗稱奶子瓶，極是傳神漂亮。尤其洪武能燒出釉裡紅軍持更是稀品，萬中無一，惹人喜愛。闊葉纏枝牡丹釉裡紅軍持是一大類，分別藏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Art Museum）、丹麥哥本哈根工藝美術博物館（Kunstindustrimuseet, Copenhagen）、及中國北京故宮、北京故宮更擁有三件構圖不同的闊葉纏枝牡丹釉裡紅軍持。

英國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有釉裡紅的平扁菊紋軍持，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收有蓮紋軍持紋飾圖案，真是白裡透紅，艷色無邊。汪慶正先生指出以上牡丹、平

頸延長，並在頸上部加小球莖圈，自的就是在頸腹之間創做空間，以便執持傾水。雖不是軍持肩部出短流，然執頸而傾已昭然若揭。

清代康熙青花軍持更自僧而俗，水、酒壺兼用，奶流轉小，出咀變大，淺斟低酌，又是另一番旖旎風光。本來軍持就是如水注一般的盛水器，水自流中出，或自器口出，均可。自唐代始，詩人以軍持水器入詩就有後蜀太妃徐氏的一首〈和題丹景山至德寺〉：

丹景山頭宿梵宮 玉輪金輅駐虛空
軍持無水注寒碧 蘭若有花開晚紅
武士盡排青嶂下 內人皆在講筵中
我家帝子傳王業 積善終期四海同
太妃率眾夜宿成都西北近郊至德寺，在彭州市的丹景山，牡丹特盛，與洛陽、荷澤齊名。夜歇梵宮，一輪明月，蔭影綠葉，寒碧淥翠，不需軍持盛水，離人里五百弓之處清靜修道的蘭若寺院，也有嫣紅牡丹開在夜裡。

唐詩人賈島（七七九—八四三）早年出家為僧，號無本，元和六年（八一—）在洛陽謁韓愈，以詩得韓

錦繡自玲瓏



院藏貿易瓷特展

An Assorted Tapestry of Lustrous Beauty:
Export Porcelains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

註釋

1. "Kundi", "Kundika" 條目，見Soothill & Hodou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中英佛學辭典，台灣高雄佛光出版社。有關東南亞據梵文對軍持不同稱號及資料，參考自Khoo Joo Ee, *Kendi, Pouring Vessel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ll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91及Sumarah Adhyatman, *Kendi: Traditional Drinking Water Container*, Himpunan Keraik, Indonesia, 1987二書。
2. 劉渤，「蜀議外銷瓷中的軍持和淨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輯，中國古陶瓷學會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266。
3.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 Brill, 1971, p. 19. 並見兩款軍持圖示28、29於該書後頁圖版XV, XVI. Volker亦提到軍持與印度、中東的水煙壺 kookah (kuhah) or nargileh相似，可能軍持受水煙壺造型影響。水煙壺「narghili」或「nargileh」為波斯語，見R.L. Hobson, *A Guide to the Islamic Pottery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32, pp. 72, 73, Fig. 89.
4. 《晉唐瓷器》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1》，香港商務，1996，頁169。
5. See William Willets, *Chinese Ar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58, vol. 1, p. 356, footnote no. 2. 論文為A. Coomaraswamy and F. Kershaw合著，"A Chinese Buddhist water vessel and its Indian prototype", 發表於*Artibus Asiae*, Dresden, vol. iii (1928-9), pp. 122-41. Ananda Coomaraswamy為早期印度佛教學者，著有*Elements of Buddhist Icon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6. 同上，Willets, vol. 2, p. 468-9.
7. 此類白定淨瓶有多個分別出土於靜志寺及淨眾院。See Robert L. Thorp, *Sons of Heaven – Imperial Arts of China*, Son of Heaven Press, Seattle, 1988, p. 148, 149，一書內之「白定刻花如意紋龍首淨瓶」，出土自靜志寺，此寺出土共七件北宋淨瓶，一為鎏金器，一件為施銅綠釉，另五件為定窯白瓷，此淨瓶即五件之一。淨眾院出土定器則為「白定刻花蓮瓣紋龍首淨瓶」，見Sonya S. Lee (李琛妍), *Surviving Nirvana – Death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5-248. 李氏稱謂據淨眾院出土文物報告，分放在不同金屬或陶器大箱子內的「聖物」(relics)竟有一百多公斤(kilograms)，其中供奉在石箱上一系列的定窯瓷瓶，正中就放著這只「白定刻花蓮瓣紋龍首淨瓶」。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亦藏有同款白瓷淨瓶，直接稱為「君稚迦」水器(Water vessel, kundika)，可見這類淨水瓶，亦已在博物館歸類入軍持類。惟其紋飾簡潔，並無刻花，只飾弦紋，短流直口，不見吐舌小龍，應是唐代風格。見Wu Tung, *Earth Transformed –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2001,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p. 58.
8. Christiaan J.A. Jorg &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Chicago: Oriental Art, 2001, p. 74.
9. 同上，頁9、10，此雙角新月瓶彩圖取自注7一書，頁111，該書稱此瓶為「明初青花纏枝番蓮元寶形執壺」。
10.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26，台北，1998，頁32。
11. *Serene Pleasure – The Jinglexu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Seattle Art Museum, 2001, p. 16.
12. Rosemary Scott, "A Highly Important 14th Century Underglaze Copper-red Kendi" in *A Highly Important Early Ming Copper-red Decorated Ewer, Kendi*, Christie's Tuesday 27 May, 2008, p. 11.
13. S.T. Yeo & Jean Martin, compiled, *Chinese Blue & White Ceramics, Arts Orientalis*, Singapore, 1978, p. 132. 由此可見，軍持發展入中、晚明，已因不同的宗教用途或社會功能而產生不同大小的流口型態。

賞識，遂還俗，然屢舉進士不第，一生苦吟。唐開成五年（八四〇），賣鳥還普州，今四川安岳縣，任司倉參軍，曾訪出家師姪鑒玄，聽他倚坐青

石講《維摩經》，維摩居士僧俗並兼，正合賣鳥心意。遂寫有〈訪鑒玄師姪〉七言絕詩一首：
維摩青石講初休，緣訪親宗到普州。

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溪裡汲寒流。岳陽溪在普州城內，賣鳥詩中的弟子與軍持，大概就是小小參軍為官在普州的一片禪心了。

作者為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系系主任兼比較文學系正教授